

略论大学校史研究与编纂

汪 洪 亮

(四川师范大学 党委宣传统战部,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大学校史是一所高校发展轨迹的真实记录,是教育史、学术史、文化史、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交叉地带。大学校史研究和编纂首先是个学术问题,同时又极具现实意义,可“彰往而察来”,为现实服务,但不可因为现实需要而“改造”历史。校史追溯须遵循“整体性继承”原则,校史研究必须实事求是,校史编纂应该学术与人文兼具。

关键词:大学;校史研究;校史编纂

中图分类号:K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5)05-0121-05

大学校庆似乎已经成为近年社会上的一大“景观”,翻检《光明日报》和《中国教育报》,时常可以看到有关百年校庆、几十年校庆的“公告”、“启事”或报道,各种校史稿也应时而生。但有的学校才过了70年校庆、80年校庆,相隔几年却又过起了百年校庆。一般认为,北大是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所国立大学。这点论证起来应该很容易,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北大庆祝建校100周年之前好几年,已有好几所大学搞了百年校庆。作为一所高校,其建校起始时间和校庆日是应该确定的。但如何确定却颇费周折,牵涉到校史追溯标准的认识。即使确定下来,学校内部往往也是众声喧哗,很难做到众口一词。1998年5月4日,北大举行百年校庆,陈平原教授撰文探讨北大的“身世之谜”,追问北大校庆“缘何改期”^①,引起众多反思,可谓曲终人未散,余音仍绕梁。一个事情看似一目了然,却往往众说纷纭。这些分歧的产生,牵涉到校史研究和编纂的原则与方法等诸多问题。笔者试对此略陈己见,以期对大学校史研究与编纂有所助益。

一 校史研究与编纂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校史研究首先应该是个学术问题。虽其主体应

是追溯过去,但因其“指向现在与未来”,故我们所见到的校史往往是“观念中”的校史,是校史叙说者经过“选择”后“重构”起来的历史。怎么选择,怎么重构,这牵涉到校史叙说者对待校史的态度:求真,还是求用?是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还是对历史进行加工为现实服务?当然,求真与求用之间,并非“道不同,不相为谋”,若能携手共进,当也能“和谐发展”。问题就在于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如何从校史的研究中,获取学校发展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传承办学过程中的教育理念与精神文化,从而达到“史言志”和“彰往而察来”的作用。

放大来说,校史是教育史、学术史、文化史、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交叉地带,正如近几年来在大学史上颇为用功的文学史家陈平原所说,“风云激荡的思潮,必须落实为平淡无奇的体制,方能真正‘开花’、‘结果’——学术思想的演进以及文学艺术的承传,其实与教育体制密不可分”[1](1页)。大学是学术、思想和文化的重要产生场所,是教育活动最为重要的阶段,其研究意义自然重大。当然,校史最原始、最基本的功能不外就是存史。编写一部科学、真实、系统的校史可以全面、完整地保存学校的史料。

收稿日期:2005-03-25

作者简介:汪洪亮(1976—),男,四川峨眉人,史学硕士,四川师范大学党委宣传统战部干事。

校史是一所学校发展轨迹的真实记录,是一所学校兴建、发展、壮大的历史,是学校各方面工作成就浓缩的精华,是一本生动的教科书,是学校传统精神的映射和风格特色的集中体现,是一所学校“自我反省”并寻求超越和确定航向的重要指针,其意义当然不可小觑。

校史研究与编纂的现实意义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校史的编写能够保存史料,为学校 and 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进行校史研究,可以对校史资料进行全面、深入的挖掘和整理,为学校党政领导、广大师生员工以及各级教育管理和研究机构提供本校历史沿革和现状的真实面貌。校史的研究与编纂有利于学校各级管理者和广大师生员工形成对校情校史的共识,有利于“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和凝聚力、向心力的形成;有利于抚今追昔、兴利除弊、与时俱进,从本校实际出发,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发扬优良校风、学风和优势特色,提升教学、科研和整体办学水平。

其次,校史并不是冷冰冰的史料集成,它可以再现学校的办学传统、文化氛围、大师风采、校友事迹,可为广大师生浸濡其间、构筑精神家园提供寥廓时空。加强校史研究,可以提炼大学精神,可以丰富校园文化,可以营造优良的育人环境,从而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激发在校学生的学习热情,影响学生的发展,使学生形成学校和社会期望的优良品质。正如有论及的:“校史教育应是高校新生入学前的必修课,是育人工作的起点。一个学校的历史和传统精神、学术文化氛围和校友的榜样,都将对一代代学子产生终身铭记的不可估量的影响。”[2]

第三,校史是学校与校友、兄弟院校、社会各界沟通与交流的精神通道。大学校史或大学“旧事”、教授录或同学录,可唤起校友的美好回忆,可激励校友回报母校,或积极资助母校,或为母校献计献策,或与母校合作科研,为母校发展尽点心力。校史研究与编纂还可起到校际交流的作用,可促进高等学校彼此了解。校史的研究和编纂是扩大对外宣传的媒介,能促进学校与社会各界之间的交流,使政府机关、厂矿企业、群众团体乃至国外的机构与学校加强了解和联系,相互交流与学习。

第四,校史研究和编纂可以为当下学校管理者提供“咨政”功能,这是它最为重要的功能和价值之一。校史研究可以围绕现实热点和重点问题,运用

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讨研究对象的传统、个性、特色和发展规律,积极参与学校发展定位、战略规划、管理改革、学科建设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二 大学校史追溯的原则和标准

正因为校史的研究与编纂意义重大,许多高校都在大搞“领土扩张”,上延建校起始时间,夸耀其历史悠久。倘于史有据,倒也无可厚非,但若拔苗助长,就不值得提倡了。对此问题,教育部办公厅曾发出通知,要求“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尊重科学的态度对校史加以确定,不能仅凭主观愿望牵强附会进行变更”[3]。

校史研究和编纂到底该遵循怎样的原则,我们应该有一部怎样的校史,具体到不同的学校和不同的学者,往往就歧见迭出。再以北大为例,季羨林先生认为:北大的历史可以“从历代的太学算起,到了隋代,改称国子监,一直到清末,此名未变,而且代代沿袭。这实际上是当时的最高学府。而北大所传的正是国子监的衣钵。这样计算,一不牵强,二不附会,毫无倚老卖老之意,而是实事求是之心”[4](74页)。同为北大教授的陈平原却所见不同,认为:“任何一个文明,必然有属于自己的教育事业;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事业,都有高等、低等之分,所谓‘大学’的起源,岂不成了‘伪问题’?”[5](5页)“大学堂与国子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有消长与起伏,却不存在交接与承继。”[6](87页)北大“永远的校长”蔡元培也说:“往昔太学国学,其性质范围,均与北京大学不可同年而语。然则往昔之太学国学,直当以高曾祖祢视之。而北京大学主体,则不得不认为二十岁之青年也。”[7](158页)

确定中国高校校史的原则与标准,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繁难的问题。近现代以来,中国高校离合聚散频繁,存亡续绝变化多端,有的高校前后更名反反复复,与其他高校校史关系也是“藕断丝连”。也就难怪,各高校或各专家对校史追溯各持己见,很难达成一致。

笔者以为,校史追溯,首先是动机要纯,要实事求是。既不可固步自封,也不可拔苗助长,对校史既不能缩短,也不能拉长。1976年以前,为了和“封、资、修”划清界限,有些高校人为割断历史,只字不提建国前的校史,这是对前人的不尊重和对历史的否认。时移势易,现在不少高校人为地拉长历史,甚至有个别高校生拉硬扯某所高等学校作为前身学校

的情况。两者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情况。

第二点是“等级要清”,要正本清源,就要弄清楚自己的“前身”是否大学,如果“前身”不是,就不应强定为本校的建校时间。正如刘海峰所言:“校史可以追溯最早的源头,不论最初是否高等学校,但既然是举办高等学校校庆,则应有标志性年代,通常应从举办高等教育时算起。”[8](59页)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拟订时,对学校等级划分是十分严格的,某学校初创时是语言学校,还是专门技术人才学校;是一所高级学堂,还是“大学堂”,其定位在政府部门都是有案可稽的。许多学校最初多是语言学校或中等技术学校,经过较长时间发展,才被政府认可为大学的。那么算校史,就应该以被认可为大学或开始招收大学生为建校起始时间,校庆日也是同样道理。要追叙学校来由是可以的,但认定建校时间和校庆日就要慎重。

第三点是处理好“前身”与“本身”的关系,强调“整体继承性”。不能根据一鳞半爪,就乱认亲戚。正如北大副校长郝平所说,寻根溯往固然好,但须“注意两者之间是否具有连贯性,以免牵强附会。有的学校‘本身’与‘前身’的间隔时间太长,而‘本身’的成立完全是彻底‘另起炉灶’,和‘前身’几乎毫无干系”[9]。追溯校史应综合考虑学校整体的继承关系,重点考察“关键因素”而非“个别因素”。在1952年前后院系调整时,有不少新建专业院校是由多所大学调整出的相同系科组合而成的,一般来说应以新组建的时间为建校时间。但若原高等学校的系科和人员成为分立或派生出的高等学校的主体,则追溯原高等学校的建校时间。若只是少量系科从另一高校迁转过来,就很难认同将另一学校的创办时间作为这一学校的建校时间[8](59页)。判断两所高校是否有继承关系,严格意义上应综合考虑教师、学生、学校性质和办学层次等因素的承接关系。至于校址、校舍因素在校史追溯中只是参考因素。同一校址办学,未必就有继承关系,就像你我先后同住一座房子,但我们未必是亲戚,更不用说是前后代关系了。但有的学校就喜欢这样追宗认祖,比如武汉大学将其前身确定为1893年由张之洞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湖南大学将其历史追溯到岳麓书院等,其主要依据就是校址和校舍因素。我们该以“前身”还是“本身”的建校时间为校庆日呢?恐怕

还是以“本身”为主较为妥当。若两者都纪念亦未为不可,但若只纪念前者就说不过去了。

教育部办公厅发文指出,高校建校历史“是”一个学术问题,还“涉及”“一定的”法律问题和“一些”政治问题[3]。但有的高校出于发扬光大办学传统的“主观愿望”,因为“个别因素”的继承关系而上延校史,笔者认为是不妥当的。原因很简单,历史可以为现实服务,但不能因为现实需要而“改造”历史。

三 校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校史研究必须建立在真实可信的资料基础上。收集资料,征集实物,是校史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经常性的工作;应获取尽可能多、尽可能全的信息,无论是否公开,无论口述还是文字材料,都要注意搜集和发掘。资料和实物的收集应和校友访谈结合起来,对德高望重、阅历丰富、年迈体弱的老校友,更要“只争朝夕”,做好史料文物的征集抢救工作。资料搜集只是初步工作,还要经过整理、分类、编目,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以获得最真实、最有用的资源。要建立电子化的数字资料库,使校史资料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校史既是“史”之一种,就应坚持史学原则,必须尊重史实,言必有据,孤证不立。立论要有史实为依据,访谈要有旁证才能成为史实。校史研究并非就事论事,在拥有丰富确凿的史料和运用严谨科学的方法的基础上,才能总结规律,发现真理,启人新知,才能挖掘办学的优良传统以及全体校友前赴后继形成的某种“精神”和“理想”。一个善于“反省”和“超越”的大学,才会在建设和发展的新征程中展现其勃勃生机。

史学工作者个人进行的校史研究暂不论列。在学校组织的校史研究中,应当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校组织的校史研究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史学的方法开展学术研究,但校史研究并非是纯学术的研究。校史研究因系“官修”,是代表学校的集体研究,而非依个人兴趣的自由研究。校史研究要讲政治、讲政策、讲大局,工作上要服从校史编委会的领导,学术观点由校史编委会把关。

二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没有继承则是空中楼阁,游谈无根;没有发展则画地为牢,无所作为。只有继往开来,方可与时俱进。须知一校之发展,总有

失误和教训,总有成绩和经验,应当辩证看待。既是写史,就当实事求是,心平气和,不能意气用事、搀杂成见,既不能以今律古,轻视前人;也不能厚古薄今,苛求来者。校史研究应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进程中提高。

三是积累和发掘的关系。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积累,历史研究尤其需要。只有“厚积”才能“薄发”,没有广度则难有深度。只有广采博收,才能拓宽视野,提高眼界。校史研究主要是史料工夫,须得夯实基础,同时又要努力发掘新的材料,开拓新的领域;校史研究又不完全是史料工夫,须得学习教育学、管理学相关理论知识,不断提高研究水平,不断推进研究的深度[2]。

校史研究应未雨绸缪,统筹规划,要做好前期资料搜集整理工作,要将校史研究作为科研课题来鼓励申报,要整合学校各机关及科研机构的研究力量,做到研究课题分工合作,资源条件互享共用,学术思想互相交流,研究成果互为补充,研究工作互相借鉴。相关子课题研究可先期着手进行,比如学校沿革、学科建设;比如分期研究,民国时期、十七年时期、文革时期等;比如人物志、大事记、院系史等等。

校史研究在方法上要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知识。除了运用传统的史学方法外,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学校的整体运行,把学校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学校的各项实际内容如教学、科研、教师、学生、组织、管理、经费、物资来源和校舍建设等等着手,探讨各个部门的结构及互动、互补关系,以及特定期高校与社会的互动和回应;可以从教育学的角度探讨各个时期的管理特点、人才培养过程与特点等,从影响教育的各种社会因素、各个层面、不同角度对学校的历史进行全方位的分析研究;档案学理论的借鉴使用也是必不可少的,而档案部门保存的有关政府的法规、政策、学校的文书、科研、人事、基建、外事、学籍等档案,为校史研究与编写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资料;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当时条件下学校办学资金的筹集、运用和办学效益等。

五 校史编纂的学术化与人文化

校史研究首先是学术问题,那么校史就应该是一部“学术化的校史”。在校史编纂中,就必须强调其学术性,遵循基本史实,理顺学术脉络。但它又不是“流水帐”式的材料累积,还要从校史的铺叙中总结出这个学校的人文精神和学术传统,找出这个

学校得以安身立命的精髓所在,找出“推动大学运作的这种精神和观念”,而这“就是大学的理想。深刻而具有崇高感召力的理想,是大学的灵魂”[10](15页)。而这才是一所著名学府与其它学校区别的重要特点和标志,所以校史还应该是一部“人文化的校史”。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校史编纂者具有相当的学养和功力。可见,学术与人文在校史编纂中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但目前在这方面,恰恰是个缺失。几乎每个高校都有校史,不少高校校史印刷还十分精美,篇幅还十分庞大,但少有优秀之作,大多千篇一律,写法雷同,共性多而个性少,尤其是本校的办学特色和思想理念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校名、校徽、校歌、历史沿革以及教职员工名录固然应有,教学科研亦不可忽略。教授学者固然赫然纸上,但多为类似表功行赏或表扬稿的简略描述,无论任教时间长短,学术贡献大小,都是平均用力,别无二致;其精神风骨及其学术地位,对读者来说,就不甚了了。这样的校史,是没有“灵魂”的校史,是没有生命的校史。

校史要记载和凸现一所学校发展进程中的各个方面,那些要记载,哪些不记载,哪里突出,哪里忽略,都是有讲究的,它反映了撰史者对学校性质、功能的体认。在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大学往往与革命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自然写校史也就不可忽略学校在各类政治运动中的历史。不过,如果下笔太多,则本末倒置。校史还是应该把中心放在“学”上,如教学、学者、学术、学生等方面。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就讲,“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有两大功能,一是培养人才,二是产生思想,这是为一般公众所认可的。从当下校史编纂的现状来看,校史应强调每所学校的治学传统和人文精神,突出每所学校的学风和个性,不管这所学校是综合性的,是师范院校,还是理工科院校。

至于校史的体例,倒无定则,视具体情况而定。但在内容上则应该学术与人文兼备。还有,校史固然应有“正史”,还应有“野史”,应有与校史配套的“校史丛书”。《老北大的故事》、《北大旧事》不见得读者就比北大校史少,影响就比北大校史小。“野史”往往更能见一校之精神,更能“复原”历史上的校园生活,更能展现几代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校史尽管重要,但各高校还很少有人去专门研

究,一般也不会设立这样的科研项目,更不会去开设校史课程,教育史领域学者也较少关注某校的历史。只有临到学校较为隆重的校庆时,才会有人注重到校史问题。长此以往,体制无保证,意义不明确,校史的写作水准难以保证。现在,很多高校设有校史办公室,性质还是行政机构,并非科研机构,办公人

员专业素养也大多不高。我认为,校史可纳入学术研究的范围,作为正式科研课题来操作。校史办公室可设在档案室(馆),应加大对校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校史作者应该是学有专长的不同学科学者的“集团军”,而非临时拼凑的“游击队”。

注释:

- ①陈平原在《北大校庆:缘何改期?》一文中考证了北大校庆日是如何从长期沿用的12月17日改成5月4日的。他认为,北大之修改校庆纪念日,生日的确定,本来只是考据问题,一旦转化为价值判断,过分追求“思想深刻”,可能会适得其反。请参考《读书》1998年第3期。

参考文献:

- [1]陈平原.自序[A].中国大学十讲[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田芊,徐振明.谈谈校史研究室的工作[EB/OL].第八届全国高校校史研讨会,2003. <http://www.dag.ecnu.edu.cn/xiaoshiyanjiuhui/dongtai/dibajiehuiyi/huiyilunwen/yanjiuhui08-2-17.htm>.
 [3]教育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校史和校庆问题的通知(教发厅[2002]6号)(2002-06-13)[EB/OL]. http://www.edugl.com/article/2005_1/200514145738.shtml.
 [4]季羨林.巍巍上庠百年星辰[J].北京大学学报,1997,(6).
 [5]陈平原.中国大学百年?[A].中国大学十讲[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6]陈平原.北大校史:怎样溯源?[J].北京大学学报,1998,(2).
 [7]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8]刘海峰.中国高校校史确定的原则与标准[J].中国高教研究,2004,(1).
 [9]郝平.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源头——北京大学[Z].未刊稿.
 [10]杜作润.中国大学理想的回首与新探[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97,(3).

On Study and Compilation of University History

WANG Hong-liang

(Publicization &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the SNUCCCP,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University history is a true record of university development. It is an important cross field of education history, academic history, cultural history and ideological history. Its study and compilation is first of all an academic issue, and at the same time serves the present reality. It is of great present reality significance, but history cannot be “changed” for the sake of present need. History retrospect must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unitary inheritance”, its study must seek truth from facts, and its compilation must be of academic and humanist properties.

Key words: university; university history study; university history compilation

[责任编辑:凌兴珍]